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 左鹏军主编

學南嶺

陳永正題

第四輯

中山大學出版社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 左鹏军主编

學南嶺

陳永正題

第四輯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学·第4辑/左鹏军主编.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306-03796-1

I. ①岭… II. ①左… III. ①文化史—研究—广东省 IV. ①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8854 号

出 版 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余泓颖

封面设计: 罗春兰

责任校对: 杨文泉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16 11.625 印张 351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文史纵横〕

屈大均的广东情结与中原认同	左鹏军	1
论今种与佛门之关系	杨 权	10
易代悲情与守儒心志		
——屈大均贞烈女性诗文的历史文化意蕴	刘雪琴	17
南越国都番禺城形态结构特征与形成原因	吴宏岐	24
家族内部地权纠纷与官府立场		
——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林 济	39
留馥堂：一个传统客家氏族的历史记忆	曾令存	50
南汉的晚清镜像及其经典化		
——由清代学海堂课卷谈起	翁筱曼	57
黄遵宪与张之洞之关系考论	郭真义	64
被忽略的南社才子李焘梦	刘奕宏	72

〔粤韵留声〕

舞队前导旗帜考.....	黎国韬	薛泽闻	78
潮州歌形成探考.....	肖少宋		88
从木鱼书之刊印看近现代岭南通俗书籍出版的特点.....	关瑾华		98
论粤剧编剧家何建青.....	谢伟国		102
《广州民国日报》中的戏曲广告研究	黄 纯		108

〔熏风自南〕

广东会馆给北京带来岭南文化.....	张卫东		123
--------------------	-----	--	-----

〔方言古今〕

- 从化州上江、下江话中古全浊声母演变看粤方言的浊音清化..... 邵慧君 132
- 《客方言》的训诂研究及其意义 谭赤子 谢玉球 136

〔文献探赜〕

- 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生卒年补证..... 陈思维 142
- 梁佩兰诗文拾遗..... 王富鹏 马将伟 147

〔杏坛弦歌〕

- 先秦文学简史..... 吴剑青遗稿 150
- 岭南词宗, 风范永存
——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詹伯慧 164
- 高校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调查报告
——以广东省为考察对象..... 徐燕琳 梁海芳 陈晓燕 167
- 斯人虽已逝 风范自长存
——吴国钦教授回忆王季思先生..... 174

- 稿 约..... 182

文史纵横

屈大均的广东情结与中原认同

左鹏军

(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 屈大均一生表现出浓重的广东情结;随着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这种广东情结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直至成为他文化信仰的重要表现形式。屈大均广东情结的内在文化渊源不仅在于对岭南的全面了解和深切体察,而且在于对以中原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一往情深,这种情愫也随着世变之亟而愈加深切,并通过具有思想价值的学术著作充分表现出来。屈大均彰显广东文化、维护汉族正统、传承儒家命脉的精神追求表现了他遗民思想的核心内涵,这种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标志性意义的思想正是他个人乃至整个广东在明清易代之际与广阔的中原地区声息相通、获得精神共鸣的契合点。

关键词: 屈大均;广东情结;中原认同;明清易代;遗民精神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岭南遗民文学研究”(批准号:09J-05)的阶段性成果。

一、广东情结:文化信仰的表现形式

屈大均一生,对于广东文化一往情深,而且在广东文化的许多方面有着独特而深切的体会。这种家乡情结首先是通过大量的诗歌表现出来的。作为一位创作了六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的高产诗人,屈大均从多个方面表现了广东的风土人情、历史事件、杰出人物,从而展现了广东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多彩面貌。

屈大均有时是以丰富的诗歌创作描绘广东的山川名胜,表现浓重的广东情结,从而使其诗歌创作获得了超越一般文学性的非凡文化价值。例如,《夜宿广州北郊作》写广州北郊经过战乱之后发生的深刻变化:“松风一接梦魂清,夜入流泉渐有声。落叶飘萧如逐客,疏钟咫尺是寒城。身依豺虎因多难,地入鱼羊为少兵。古道呼壶人不到,青磷相照到天明。”^①《吊厓》云:“虎头门外二洋通,想像精灵满海东。一代衣冠鱼腹里,千秋宫阙蜃楼中。乾坤开辟无斯变,龙凤驱除亦有功。万古人伦能再造,高皇神烈自无穷。”^②

诗人有时是通过对广东风物人情的真切描述来表达对于家乡的熟稔和热爱。例如,《民谣》十首其一:“白金乃人肉,黄金乃人膏。使君非豺虎,为政何腥臊?”其六:“小府为鱼肉,大府为庖厨。金多免刀俎,且复得安居。”其九:“俯有十千拾,仰有五万取。作使诸豪奴,官大好行贾。”^③《广州竹枝词》七首其四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其五云:“十字钱多是大官,官兵枉向澳门盘。东西洋货先呈样,白黑番奴拥白丹。(白丹,番酋也。)”其七云:“好笋是人家里竹,好藕是人家里莲。好崽是人家里婿,鸳鸯各自一双眠。(崽音宰,粤人谓子曰

①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②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③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息。)”^① 这些诗歌除真切地传达出极具特色的广东地方风物和风土民情之外，还表现出诗人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清晰的地理观念，对于由于时代变迁而带来的风物人情的变化也有所反映，可见诗人面对家乡风物时态度之清醒和眼光之独特。

屈大均对于澳门商业贸易和深刻变化的表现，特别是对澳门现状和将来可能给中国带来巨大影响的担心，可见诗人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如《澳门》六首其二：“南北双环内，诸番尽住楼。蔷薇蛮妇手，茉莉汉人头。香火归天主，钱刀在女流。筑城形势固，全粤有余忧。”其五：“山头铜铎大，海畔铁墙高。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人惟真白氍，国是大红毛。来往风帆便，如山蹕海涛。”^②《广东新语》卷二《地语》“澳门”条有云：“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蠲镜为澳。……澳有南台、北台。台者山也。以相对，故谓澳门。番人列置大铜铎以守。……澳人多富，西洋国岁遣官更治之。诸舶输珍异而至，云帆蹕风，万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载白金巨万，闽人为之揽头者分领之，散于百工。作为服食器用诸淫巧以易瑰货，岁得饶益。向者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阴与为市，利尽归之。小民无分毫滋润。今亦无是矣。”^③

还有一类诗歌是通过对某些历史或当时人物、事件的描述以表达沉重的历史体味和深切的现实感慨，从而直接地反映诗人的情感和判断。这是屈大均广东情结最集中、最深挚的表现。《读陈岩野先生政要》云：“往日陈都谏，谋猷信有余。初闻哀痛诏，即上治安书。丞相劳相疾，君王叹不如。可怜捐七尺，地下奉銮舆。”^④ 诗中“政要”指陈邦彦所著《中兴政要》，内有端本、肃吏、保民、励俗、制用、驭戒、固圉、讨逆八篇三十二策，凡一万七千余言，皆指陈得失，以图恢复者。《春山草堂感怀》十七首其一：“地因滨海湿，人以著书贫。况复多风雨，弥令叹苦辛。半生游侠误，一代逸民真。菽水劳妻子，窗间刺绣频。”其十二：“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尊周存信史，讨贼作词人。素发垂三楚，愁心历九春。桃花风雨后，和泪共沾巾。”^⑤ 是诗作于康熙九年（1670年）大均继室王华姜卒后，春山草堂是大均番禺故里之居室名。

屈大均浓重的广东情结的第二个突出表现，就是穷二十年之精力，终于在晚年完成了兼具史志价值和诗性精神的关于广东文化的巨著《广东新语》。《广东新语》不仅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史地位，而且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历史影响。

据邹庆时《屈大均年谱》所载，《广东新语》于明永历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即公元1678年成书，时屈大均已四十九岁。是谱于本年下记曰：“先生撰《广东新语》二十八卷成。先生自刻所著书皆无年分，第一行序字，第二行姓名，第三行序文，殆以避暑新朝年号也。”^⑥ 不仅《广东新语》一书有意避免使用清朝年号，而且屈氏的所有著作皆如此。

对于《广东新语》的价值，屈大均也表现得非常自信，他在此书卷首的《自序》中说：“《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阙也。”^⑦

《广东新语》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关于广东的笔记著作，这一点已成为公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蕴涵的主观色彩和时代特征，这种诗性精神不仅是作者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经过精心准备的有为之作，而且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其独立思想、反抗个性的学术化表达。这种精神，不仅与屈

①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0～611页。

②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74～875页。

③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8页。

④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⑤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322页。

⑥ 邹庆时：《屈大均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⑦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原壹志南国、独立不迁、伤时忧国、悲天悯人的精神相合，而且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诗性精神和理想人格追求相通。《广东新语》中透露出的这种诗性精神和人格追求使之超越了一般的史志、笔记著作，从而获得了学术文化意义以外的一种思想文化意义。这是其他史志笔记著作所不能达到甚至是难以比拟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是，作者经常在比较客观地记录广东风物或人物之余，在字里行间或结尾处发表议论或表达感慨。这种具有强烈主观情感和价值判断的成分使《广东新语》具有不同于普通史志笔记著作的特殊性质，也使之获得了作者思想与行事的风神。

在关于山川自然的诸语中，作者的主观情感、价值判断即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如《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厓门”条：“厓门，在新会南，与汤瓶山对峙若天阙，故曰厓门。自广州视之，厓门西而虎门东。西为西江之所出，东为东、北二江之所出。盖天所以分三江之势，而为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陆丞相、张太傅，以为天险可据，奉幼帝居之。连黄鹄、白鹄诸舰万余，而沉铁碇于江。时甯势尽，卒致君臣同溺，从之者十余万人。波涛之下，有神华在焉。山北有一奇石，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恶之，命削去，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白沙先生谓当书‘宋丞相陆秀夫负帝沉此石下’，瑁不能从。光禄郭棐谓，如白沙者，则君臣忠节胥备，其有关于世教更大。而予则欲书‘大宋君臣正命于此’，凡八字，未知有当于书法否？”^①对于厓门巨石上所书何字、当书何字不厌其烦的辨析，显然有作者评价宋代灭亡经验教训的深意寓于其中。

而在关于艺术人文的诸语中，屈大均同样有意识地表达这种根深蒂固的诗性精神、主观评价和兴亡感慨。如《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曲江诗”条：“东粤诗盛于张曲江公。公为有唐人物第一，诗亦冠绝一时。玄宗尝称为文场元帅，谓公所作，自有唐名公皆弗如，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云。而公为人虚公乐善，亦往往推重诗人。为荆州时，辟孟浩然置幕府，又尝寄罗衣一事与太白，故太白有答公寄罗衣及五月五日见赠诗。而王摩诘有‘终身思旧恩’之句。浩然则有陪公游宴诸篇。三子者，皆唐诗人第一流，他人鲜知罗致，独公与之相得。使玄宗终行公之道，不为小人谗间，则公之推诚荐引，以为国家经纶之用者，又岂惟诗人而已哉？剑阁蒙尘，始潸然追念。噫嘻，亦已晚矣！少陵云：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盖谓公也。丘文庄言：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烨烨有光气。信哉！”^②不仅充分肯定张九龄在岭南诗歌史上的开创性贡献，而且表达了一种深深的遗憾：假若唐玄宗能够充分信任和任用张九龄，那么张氏对于唐王朝的贡献岂仅为一个诗人而已？由此反映出张九龄一生经历与事业的幸运与不幸。这一见识显然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感受，较一般对于张九龄的评价要深刻许多，也更具有启发思考、引人深思的价值。卷十二《诗语》“邝湛若诗”条写道：“湛若南海人，名露，少工诸体书。督学使者以恭宽信敏惠题校士。湛若五比为文，以真、行、篆、隶、八分五体书之。使者黜置五等，湛若大笑弃去。纵游吴楚燕赵之间，赋诗数百章，才名大起。岁戊子，以荐得擢中书舍人。庚寅，奉使还广州，会敌兵至，与诸将戮心死守。凡十阅月城陷。幅巾抱琴将出，骑以白刃拟之，湛若笑曰：‘此何物可相戏耶？’骑亦失笑。徐还所居海雪堂，环列古奇器图书于左右，啸歌以待骑入，竟为所害。为人好诙谐大言，汪洋自恣，以写牢骚不平之志。或时清谈缓态，效东晋人风旨，所至辄倾一座。至为诗，则忧天悯人，主文谲谏，若《七哀》《述征》之篇，虽《小雅》之怨诽，《离骚》之中爱，无以尚之。……子鸿，字剧孟，亦负不羁之才，年二十余，能诗及击剑。先时丙戌之变，率北山义旅千余，战敌于广州东郊死之，得赠锦衣千户。父子皆烈士也。而世徒以为风流旷达诗人也。噫！”^③重点显然不在于评价邝露之诗，而在于强调邝氏父子的“烈士”性格与不屈精神。而在世变鼎革之际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格和精神不仅极为难得、极为珍贵，而且与屈大均本人的个性特点和精神追求若合符契。这也许

①（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页。

②（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5～346页。

③（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0～351页。

就是屈大均对邝露父子英雄人格产生强烈共鸣的深层原因。

《广东文选》选辑自汉代至明代广东重要人物的诗文作品为一编，是屈大均晚年完成的又一项重大学术工作。从广东文化精神和文学学术传承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广东文选》的编选是屈大均广东情结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中寄托了编选者传承与弘扬广东文化的深远用意。

屈大均本人对《广东文选》一书非常重视，甚至是饱含深情的。他在《广东文选·自序》中就动情地说：“嗟夫！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于吾之乡，斯在于天下矣！惟能述而后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圣。吾所以为父母之邦尽心者，惟此一书。”^①可见作者对于家乡和家乡文献的一往情深，作者为桑梓之地、父母之邦尽心尽意的坚定信念从中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得到。在《广东文选·凡例》中，屈大均进一步揭橥编选的标准和追求的目标：“是选以崇正学、辟异端为要，凡佛老家言于吾儒似是而非者，在所必黜。即白沙、甘泉、复所集中，其假借禅家言，若悟证顿渐之类，有伤典雅者，亦皆删削勿存。务使百家辞旨，皆祖述一圣之言，纯粹中正，以为斯文之菽粟，绝学之梯航。”^②还说：“吾粤诗始曲江，以正始元音先开风气。千余年来，作者彬彬，家三唐而户汉魏，皆谨守曲江之规矩，无敢以新声野体而伤大雅，与天下之为袁徐、为钟谭、为宋元者俱变，故推诗风之正者，吾粤为先。是选中正和平，咸归典则，于以正人心、维风俗，而培斯文之元气，于是乎在。以此选一邦，即以此选天下，无不可者。以《春秋》之谨严，为诗人之忠厚，不佞窃有志焉。”^③以此书倡导和恢复儒家正统、保持与弘扬广东文学正脉的用意不仅非常明显，而且特别坚决。这当是屈大均针对当时广东乃至全国世风、文风状况的有感而发。

《广东新语》卷十一《文语》即以“广东文集”条弁首，中有云：“予尝撰《广东文集》，其序云：……嗟夫！一国之人文，天下之人文也。知天下于一国，知一国于一人。此一人者，其出则必如文献，处则必如文恭者也。典型既往，后学无师。吾安得不为斯文之绪有深虑乎？……嗟夫！广东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巨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其或入告之嘉谟，或谈道之粹论，或高文典册，记载功勋，或短章数行，昭彰懿行。其义皆系于人伦，其事多裨乎国史。作者深衷，鬼神可质，岂可挂一漏十，令其泯没无传？将一邦人物之盛，著作之宏多，反不如珞珠翠羽，犀象珊瑚，水沉伽南诸珍怪，犹能尽见于世，是岂有志好古敏求者之所忍乎？……嗟夫！广东者，吾之乡也。一桑梓且犹恭敬，况于文章之美乎？文者道之显者也，恭敬其文，所以恭敬其道。道在于吾乡之人，吾得由其文而见之，以为尚友之资，以为畜德之本，岂非吾之所以为学者乎？其不能一一镂版以传，则以贫也，有所待于有力者也。然予将终身以之，若愚公之徙太行，精卫之填东海，不以其力之不足而中辍也。知者鉴诸！”^④

《广东文选》特别有针对性且有文化价值深意的编选标准，在编辑实践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现。这在此书对于广东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上某些重要作家、学者、关键人物的重视与关注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比如张九龄、余靖、崔与之、丘濬、孙蕡、黄佐、邝露、郑学醇、欧大任、欧大相、陈献章、湛若水、陈邦彦、梁有誉、黎民表、黎贞，都是屈大均特别重视的人物，从这一串人物名单中，即可以约略体会到编选者对广东历代人物的取舍与评陟，其中寄托的文化情怀也清晰可见。

无论是从岭南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都可以认为屈大均是对广东文化如此用心、勤勉一生、著述甚丰并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的第一人。屈大均的这种开创性贡献不仅远绍前人的传统，而且具有超越同侪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在后来者中亦鲜有堪可与之比肩者。

①（清）屈大均辑：《广东文选·自序》，陈广恩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清）屈大均辑：《广东文选·自序》，陈广恩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③（清）屈大均辑：《广东文选·凡例》，陈广恩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④（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6～320页。

二、中原认同：广东情结的文化渊源

从文化价值观念的渊源上看，屈大均在世变之时、鼎革之际对于广东文化的一往情深和着力提倡，是以对于中原文化为代表的汉族正统文化的深度认同为基础的。这种认同，从屈大均早年就开始萌生，而随着时代的巨变，明朝为清朝所取代，甚至连岭南这如此偏远的所在也全面地成为清朝的天下。在这种天崩地解、江山变色、政治文化环境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屈大均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明显有所加强，以至于成为他最重要的文化信仰，成为他判断的主要标准和行为的主要准则。

在屈大均看来，清军虽然以血腥的手段征服了广东，但是这最后失去的汉族土地上，最大可能地保留了汉族的民族血脉和传统文化，这正是汉族同胞永不屈服、志图恢复、还我河山的文化之源，就如同南宋王朝虽然最后在广东灭亡，却留下了深远的民族精神和历史遗响一样。而且，在屈大均的思想意识中，南宋之亡与明朝之亡的历史竟然是如此的相似，无论是就时间来说还是就空间来说，都距他是如此之近。这种直接而巨大的冲击之下造成的历史兴亡之感成为屈大均思想中最为深刻的冲突，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他不能不思考和探寻其中的究竟，并志图恢复汉族的河山。

屈大均的中原认同在诗歌中有着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成为他创作意识中一个特别强烈的思想主题。屈大均对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广阔汉族所在地区的山川名胜的展现与描绘，是他中原文化认同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过大梁作》云：“浮云无归心，黄河无安流。神鱼腾紫雾，苍鹰击高秋。类此雄豪士，滔滔事远游。远游欲何之，驱马登商丘。朝与侯嬴饮，暮为朱亥留。悲风起梁园，白草鸣飕飕。挥鞭空鸣镝，龙骑如星流。超山逐群兽，穿云落两鹭。归来宴吹台，酣舞双吴钩。惊沙翳白日，垂涕向神州。徒怀匹夫谅，未报百王雠。红颜渐欲变，岁月空悠悠。”^①在开封这一著名古都，也是中原的腹地，展开古今兴亡的沉重思考。《黄河舟中作》云：“河流黄日月，万里客愁中。天入清霜苦，人过白草空。暮心生寂寞，春气破鸿濛。吾道宜沧海，乘桴孰可同。”^②《过涿州作》云：“树木何飕飕，黄云千里愁。日月争驰驱，民生谁获休？置酒华阳馆，五鼎烹肥牛。太子捧金卮，美人弹箜篌。数石不得醉，悲歌恨仇雠。歌舞欢未终，将军刎其头。惊风起燕台，溇沱咽不流。男儿得死所，其重如山丘。白刃若春风，功名非所求！”^③《秣陵》写在明代故都南京的感受：“牛首开天阙，龙冈抱帝宫。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如何亡国恨，尽在大江东。”^④《大同感叹》描绘山西大同的惨象：“杀气满天地，日月难为光。嗟尔苦寒子，结发在战场。为谁饥与渴，葛履践严霜。朝辞大同城，暮宿青磷旁。花门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槽中，马饮毛生光。鞍上一红颜，琵琶声惨伤。肌肉苦无多，何以充君粮？踟蹰赴刀俎，自惜凝脂香。”^⑤凡此均可见作者在广袤中原大地上的沧桑之感和沉痛心情。

诗歌中对中原地区的某些具有文化象征意味或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追怀，也是屈大均中原认同的一种重要形式。出于对江山易主、山河变色的极度敏感和深刻不安，他经常被耳闻目睹的有关历史人物或事件的遗址所吸引，并进而由此抒发古今兴亡的感慨，这似乎已经成为屈大均的一种思考习惯和行为习惯。《邯郸道中》云：“叹息丛台下，英雄日寂寥。战场无白日，旷野一秋雕。草没廉颇宅，云迷豫让桥。悲歌谁与和，归思晚萧萧。”^⑥《豫让桥》云：“国土感知己，能将七尺轻。击衣仇已报，

①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②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③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④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⑤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267页。

⑥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吞炭气难平。漳水西风急，邢台落日晴。千秋石桥上，过客马犹惊。”^①通过对廉颇、豫让等历史人物的追怀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寄予深刻的感慨于其中。《鲁连台》云：“一笑无秦帝，飘然归潞东。谁能排大难，不屑计奇功。古庙千秋月，荒台万木风。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②写鲁仲连的英雄气概，得出了“从来天下士，只在布衣中”的认识，这对以功名利禄为念的肉食者来说，不啻是辛辣的讽刺。《塞上曲》六首其三云：“亭障三边接，风沙万古愁。可怜辽海月，不作汉时秋。白草连天尽，黄河倒日流。受降城上望，空忆冠军侯。”^③在塞上这曾有无数英雄人物立下丰功伟绩的所在，思想起霍去病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在强烈的今昔对比中，表达诗人无尽的沧桑感慨。《吊袁督师》表达对广东东莞袁崇焕的崇敬之情：“袁公忠义在，堪比望诸君。百战肌肤尽，三年训练勤。凉州无大马，皮岛有骄军。一片愚臣恨，长悬紫塞云。”^④这种感受对于从广东而至山海关外的屈大均来说，必然特别亲切而且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

《秣陵春望有作》十六首其中四首云：“留得江山一片秋，可怜失国尽风流。凄凉更有金川事，烟草兼含六代愁。”“日落中原虎豹骄，乾坤无力捍南朝。谁教一代衣冠尽，白骨青苔锁寂寥。”“烟雨春光澹欲无，年年愁满莫愁湖。清明莫向江南过，芳草萋萋是故都。”“江左衣冠久已倾，看花谁问凤凰城。年年此地逢寒食，歌罢龙蛇泪满缨。”^⑤可见屈大均对于南京具有非同寻常的感情，或准确地说，明朝的兴起之地南京城，总是令屈大均产生特别强烈的兴亡沧桑之感，总是使他意绪难平。《寒食》云：“烟雨催寒食，江南又暮春。可怜三月草，看尽六朝人。”“自与台城别，艰难觅故君。年年寒食日，望断孝陵云。”^⑥台城旧址在今南京市鸡鸣山南，本是三国时代吴国后苑城，东晋成帝时改建。从东晋到南朝末，这里一直是朝廷台省（中央政府）和皇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枢，又是帝王享乐场所。中唐时期，昔日繁华的台城已是“万户千门成野草”，至唐末，这里就更荒废不堪了。明乎此，屈大均到此地而产生的兴亡之感如此强烈，就是极为正常的了。《扬州感旧》云：“往日芜城困，君臣总不知。频飞丞相书，不遣靖南师。蓟北天崩后，江南空斗时。血书三四纸，读罢泪如丝。”^⑦屈大均对于曾发生十日屠城惨剧的扬州怀有特别的关注，并由此对清军血腥屠杀汉族同胞的罪行予以再次揭露，也是不能不如此、非如此不可的表现了。

屈大均所结交的多是怀有强烈民族意识、具有坚定的汉族立场的人士，在广东如此，在中原等地更是如此。这种交友取向实际上不仅反映了古人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朴素道理，而且更多地表现了在民族斗争之中、汉族危亡之际屈大均清晰而坚定的民族立场和反清精神。这种立场与精神不仅可从广东籍人士陈恭尹、王煥、王隼、温汝能对屈大均的高度评价中看出，而且从非岭南人士朱彝尊、钱谦益、潘耒、曹溶、陈维崧、毛奇龄等的褒奖赞誉中，也可以更有力、更充分地感受到。

屈大均对于时人时事的记录与品评，多怀有深沉的物是人非、古今沧桑、世变兴亡的感慨，这就使他对于这些人和事的态度和评价具有文化认同的价值。《过太原傅丈青渚宅赋赠》云：“唐氏遗民在，忧思正未央。故人期饮食，良士戒衣裳。苓采今无地，桐封旧有乡。叔虞祠下柏，与尔共风霜。”“下马晋王宫，山河感慨中。无成空老大，不死即英雄。汾水城堪灌，并门骑易通。思深当岁暮，且咏有唐风。”^⑧从傅山坚定的遗民立场中，获得了深刻的文化认同。《梅花岭吊史相国墓》云：“往昔江南北，谁分上相忧。自从开四镇，不复问中州。精爽凭飞将（谓高公杰），衣冠在古丘。梅花春不发，碧血满

①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②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③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④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⑤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

⑥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⑦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

⑧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枝头。”^①《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六云：“四月十八日，扬州被围。可法御之，薄有斩获。啖血为书请援，不应。开门出战，本深遽率众迎降。越七日，城陷被屠。降夷押住者从可法出城，且战且走，渡河马蹶，可法溺死。”^②可见屈大均在抗清英雄史可法墓前的感受。《赣州吊丙戌忠节诸公》云：“城南杀气似黄埃，三十年间黯不开。腐肉犹香章贡水，忠魂多在郁孤台。”“三宫未得凭天险，十里徒然设地雷。秋色岂堪重眺望，乾坤处处白龙堆。”^③此诗康熙十九年（1680年）秋南归道中作。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刘同升、万之吉、杨廷麟、黎遂球等守赣州，抗击清军，城破死。可见作者对坚守赣州抵抗清军南下，直至最后牺牲者的凭吊与怀念，其中黎遂球即是屈大均的同乡——广东番禺人。

而《哭顾宁人征君炎武》七律四首，通过对顾炎武的怀念，表达了特别深沉的世道沧桑、故人零落、天下无人、悲苦无依之感。其一：“幽燕久客似辽东，絮帽天寒苦朔风。飞兔有人还不帝，伏龙于尔独称公。白头无子遗书散，黄石多年故冢空。留得孝陵图记在，教人涕泪哭遗忠。（君有《孝陵图》及《昌平山水记》。）”其二：“昌平山水是天留，海岳朝宗此帝丘。一代无人知日月，诸陵有尔即春秋。书生得尽惟哀痛，故老难存苦白头。遗骨故应园下葬，年年天寿守松楸。”其三：“招魂不返恨天涯，旅榭空归葬海沙。楚国两龚长不食，淮阳一老久无家。苍松岁晚孤生苦，白鹭天寒两鬓华。闻道五经多注释，不知谁为作侯芭。”其四：“登高忆共雁门间，北望京华洒泪还。白马小儿犹汉殿，青牛老子已秦关。河声不解消长恨，山色谁知老玉颜？耆旧只今零落尽，北邙松柏为君攀。”^④在屈大均一生写下的众多哀悼前人、怀念逝者的诗作中，这几首诗因为充分表达了遗民的悲苦、末世的苍凉，而显得具有特别重的分量。

除诗歌创作以外，屈大均晚年致力于广东文献的研究和有关著作的撰写，这是他在更加强烈的自觉意识驱动之下将早年就已经开始的事业坚决地继续下去，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的一种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东新语》的撰写和《广东文选》的编选，此外还有地方志著作及《皇明四朝成仁录》等。从思想文化观念、与中原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看，屈大均的这种选择具有更加明显的坚守汉族正统观念与护持正在被泯灭、有可能走向消亡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意味。

因为在屈大均看来，广东这块汉族文化的最后栖居地，岭南这块最晚被清朝占领的汉族江山，是最有可能保留一些汉族文化痕迹、存有一点汉族文化传统的所在。当广大的中原地区早已被征服，早已成为异族统治的天下的时候，他的多种想法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即通过对广东文献、人物、文学、历史、山川的记载和表彰，来彰显这片土地上仍然可能遗存的汉族文化传统。因此，屈大均晚年关于广东文献的整理、研究和著述，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思想文化活动。他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也是更长久的方式传承着处于灭亡危机之中的汉族文化，是在以一种不得已的途径护持着已经被异族征服了的汉族正统。这是屈大均如此深切地认同中原文化的根源所在，也是屈大均遗民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

三、广东与中原的契合：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精神

明清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遗民精神空前兴盛并臻致高峰的关键时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虽然这种惊天动地的遗民精神主要发生于以江浙为中心的东南地区，但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岭南遗民精神也极堪关注。

岭南遗民精神正式发生于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之际，对于汉族士人来说，异族入主中原并成为稳定

①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491页。

②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0页。

③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页。

④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的统治者，成为遗民精神发生的最直接触点。明清之际的岭南遗民精神，一方面是岭南宋遗民影响之下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从宋到元、从明到清这种历史的相似性使岭南士人更直接与更深切地体会到遗民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在许多岭南士人看来，南宋被蒙元所取代，明朝被清朝所取代，不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且距广东是如此之近，真切的时局动荡、改朝换代的巨变就发生在他们身边，历史仿佛重新上演了一次令汉族同胞伤心不已的亡国哀曲。于是，在明清之际的岭南，产生了另一批遗民文人群体，而且这一群体较宋末元初那一次更加强大。这是岭南遗民精神的第一次充分彰显，也是最有光彩的一次闪耀。

屈大均无疑是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群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岭南遗民精神的杰出代表。实际上，屈大均对自己的遗民身份是很清楚的，甚至是有意强化的，比如他在《春山草堂感怀》十七首其一中，就曾经说过“半生游侠误，一代逸民真”^①。他还在《咏史》中写道：“匕首频虚发，无成愧丈夫。心悲虽故国，事去未穷途。巨野堪为盗，朱家且作奴。如何惭一母，无食向江湖。”^②他的《临危诗》则更加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丙子岁子朝，占寿于古哲。乃得邵尧夫，其年六十七。我今适同之，命也数以毕。所恨成仁书，未曾终撰述。呜呼忠义公，精神同泯物。后来作传者，列我遗民一。生死累友人，川南自周恤。独漉题铭旌，志节表而出。华趺存后人，始终定无失。林屋营发冢，俾近冲虚侧。”^③诗中的“成仁书”指的是《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可见屈大均对此书的看重，更可见屈大均对自己这种文化选择的清醒认识。除诗歌创作外，屈大均所结交、所钦重的具有遗民品格的岭南人士和中原人士，都一再证明着这一点。

屈大均对所可交往的人士相当尊重，对自己的声名也非常爱惜。屈大均去世之后，一些人士也多是英雄气概、伟岸人格的角度评价他，集中反映了后人对屈大均不屈意志、坚毅节操、伟岸人格的认同与崇敬。清末诗人沈汝瑾在《国初岭南江左各有三家诗选阅毕书后》中说：“鼎足相诗笔墨酣，共称诗佛不同龛。珠光剑气英雄泪，江左应惭配岭南。”又说：“翁山奇气胜虞山，被禁仍留天地间。忠孝更推陈独漉，贰臣相对合羞颜。”^④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云：“浩翰雄奇众妙才，遗民谁似岭南才？只应憔悴灵均裔，饭颗山前赌句来。”有注文云：“陈恭尹元孝《独漉堂集》。岭南三家胜于江左。翁山五言，神似青天劳莲；独漉七古，不减工部。洵并时之劲敌。”^⑤可以看出，其重点并不在于比较评价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这岭南三大家的高下得失，而在于强调明清之际岭南地区迸发出来的强大的遗民精神，具有震古烁今的思想价值。近代诗人金天翮在《与郑苏堪先生论诗书》中说：“天翮二三百年来诗人服膺亭林、翁山，谓其歌有思，其哭有怀，其拨乱反正之心，则犹《春秋》、《骚》、《雅》之遗意也。”^⑥强调的也是屈大均诗中的思想与襟怀，特别是阐发儒家经典思想、传承汉族正统观念的精神气质。这是一种可以在世变之际融通古今、跨越南北的文化精神。

广东近代诗人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中，有咏屈大均诗四首。其第一首云：“儒素缁蓝托意深，诗人气骨自森森。从来燕赵称豪杰，舍却沙亭何处寻？”第四首云：“九世深仇虽可复，千年正统未能存。诗亡义有春秋在，可读先生宋武篇。”均表达了对屈大均道德文章、人品诗作的由衷钦敬，作者的感情溢于言表。在诗注中，首先引用胡汉民（字展堂）关于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这“岭南三家”诗之联系与区别、取径与高下的论述：“窃谓翁山之诗，以气骨胜；元孝之诗，以情韵胜；药亭之诗，以格律胜。翁山如燕赵豪杰，元孝为湘沅才人，药亭乃馆阁名士也。”不仅可见胡汉民论诗的见识与观点，而且可见陈融对胡汉民这种观点的认同。

①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②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1页。

③ 陈永正：《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1059页。

④ 转引自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9页。

⑤ 转引自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4页。笔者对原标点略有调整。

⑥ 转引自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9页。

生活于清乾隆末年至道光中期的诗人思想家龚自珍，在屈大均的著作还犯忌被禁之际，就曾读过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夜读番禺集，书其尾》中写道：“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又云：“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①确是如此。岭南诗人、学者、思想家屈大均以出众的才华和过人的胆识，在时局纷乱、兴亡难测、人心不古的明清之际，以坚定的信念和伟大的人格彰显了岭南遗民精神的深远渊源和思想高度，从而成为岭南一代士人的杰出代表；而这种遗民精神和文化信仰也使他个人和整个岭南一道，汇入了当时盛行一时、影响广泛的维护汉族正统和儒家传统的思想潮流之中，从而使岭南与中原乃至岭北的广阔地区获得了文化沟通、声息相关的重要基础。

从岭南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屈大均的遗民精神不仅是他个人与中原相通的契合点，而且是岭南地区与中原相契合的关节点，也是来自岭南的声音汇入时代风潮的重要标志。于是，屈大均的诗性精神、遗民思想、抗争意志获得了超越岭南文化与学术本身的典范性价值，具有彰显易代之际士人品格和时代精神的独特意义。

^①（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5页。

论今种与佛门之关系

杨 权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275)

摘 要: 清初遗民僧今种(屈大均)在番禺员岗村雷峰海云寺出家,拜函昱为师;后又到南京天界寺转礼道盛禅师,受菩萨戒。他所以转换门庭,是因为与天然及其法嗣有矛盾。而矛盾产生的根源,又在于他与函昱等人只是政治上的同道,而不是思想上的同志。这位“僧服儒心”的袈裟遗民还俗后,曾大张旗鼓地辟佛。他这样做,在思想根源上来说是因为受到了其所持的儒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影响,他与大汕和尚的交恶,可能也强化了其辟佛的态度。

关键词: 清初;遗民僧;今种;佛教

清初岭南的著名诗人屈大均曾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落发为僧,法名今种。十二年后,他又脱离佛门,还俗归儒。由学儒始,间以参禅,而返终于儒。其人生轨迹,反映了一个人思想的复杂性。笔者已撰《今种的出家与还俗》一文探究事情的因果,兹再撰此文研究今种与佛门的关系。为行文方便,笔者把出家前后的屈大均均称作“今种”。

一、今种与海云系法众的关系

饶宗颐先生曾指出,清初遁入空门的才俊胜流,“其活动自江南迤及岭南,徒众之盛,实以金陵天界寺觉浪上人一系,与番禺海云天然和尚一系最为重镇”^①。袈裟遗民今种,与清初佛门这两大重镇都曾发生过关系。他先是于顺治七年(1650年)在番禺员岗村雷峰海云寺出家,拜天然函昱和尚为师;又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左右到南京天界寺转礼觉浪道盛禅师,受菩萨戒。

今种最初的师父函昱字丽中,号天然,俗名曾起莘,出生于番禺慕德里吉迳村(今属花都),是明崇祯朝的举人。他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在赴京参加会试的途中在江西庐山归宗寺皈依佛教,礼宗宝道独和尚。后入住广州诃林(即今光孝寺),应机施教,遂使宗风丕振,道声远播。国变后避地番禺雷峰海云寺,历住罗浮山华首台、广州海幢寺、丹霞山别传寺、庐山栖贤寺诸刹。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继道独主罗浮山华首台法席,成为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函昱集曹洞宗的法门砥柱、明遗民的精神领袖与“海云诗派”核心人物于一身,与其师弟函可、徒弟今释并称“清初岭南三大遗民僧”。

今种在出家之前就已经与函昱有交往。据文献记载,早年函昱曾介绍他到粤秀山,从陈邦彦学《周易》和《毛诗》,因为这一机缘,今种与陈邦彦结下了师生深谊。后来清军占领广州,陈邦彦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与陈子壮、张家玉联手在广州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抗清起义,他毅然参加了这场武装斗争。结果陈邦彦兵败被杀,今种逃隐于家。也许是由于出家前在岭南已享大名的缘故,今种进入宗门后,最初颇受其师的器重。函昱曾安排他到海幢寺担任道独的侍者,以助老人“网罗散失”、编辑《憨山大师梦游全集》。而道独老人也颇欣赏今种的才学,曾在完成佛学著作《华严宝镜》后,请他的这位徒孙作跋。

但是,今种是在明清易代的特殊政治背景下逃禅的,在本质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而只是

^① 饶宗颐:《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清初岭南禅学史初编序》,见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披上了袈裟的儒生，是典型的“僧服儒心”者。他曾坦承：“予昔之于二氏也，盖有故而逃焉，予之不得已也。”^① 因为是“不得已”而“逃”，所以他不免“身在曹营心在汉”，隐身于浮屠，却又不愿以浮屠自待，心中所持奉的，仍然是儒家的理论体系与价值观念。他是僧人，却不愿着僧装。他在《髻人说》中谈到：

庚寅年二十一，又复髻，则予遂圆顶为僧，然犹不肯僧其帽，终岁间戴一青纱幅巾。壬辰年二十三，为飘然远游之举。以城市中不可以幅巾出入，于是自首至足，遂无一而不僧。^②

后来虽因外在压力而不得不全副僧装，但内心中也无为僧的自觉意识。他曾坦言：“士君子不幸而当君父之大变，僧其貌可也，而必不可僧其心。”^③ 既无“僧心”，就难免和世俗社会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出家期间常常东颠西跑，从事与佛事无关的政治活动。他曾两次逾岭北游，以僧人身份为掩护，到江南南北联络仁人志士进行反清复明斗争。这一点，与其师函昱有很大的差别。作为清初曹洞宗的一代宗师，函昱是对佛教具有高度信仰的自觉出家人，而不是逃禅者。其《刻〈牟子辨惑〉叙》中有“由教乘入宗趣”^④ 之语，这是他确立了佛教信仰的自我说明。正唯其如此，他才能以禅为纲，以儒入佛，融通各宗，在钻研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写出《首楞严直指》、《金刚正法眼》、《楞严心印》、《般若心经论》等一系列理论专著。他对抗清志士们虽然持欣赏的态度，甚至暗中保护他们、支持他们的反清活动，但这只是基于民族大义而采取的立场，与今种像在俗的士人一般直接卷入反清复明斗争，性质并不相同。

因此，今种虽然已拜函昱为师，但是在思想交流方面很难做得到与师父融通无碍。他们说到底只是政治上的“同路”，而不是思想上的“同志”。他们在保持民族气节、反抗清朝统治这个问题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但是在对佛教的认识与对出家的态度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种差别，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长久走在一起，终会有分道扬镳的一天。潘耒的《屈翁山复石濂书跋》，便披露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今种）既以天然为师，转而师觉浪，欲与天然为雁行。天然诸法嗣不与，乃推奖石濂，认为同门，以压阿字、澹归，皆出私意；甚至代石濂作书，以触犯本师，何倒行逆施至是！^⑤

上面这段文字，对我们认识今种与函昱及海云系法众的关系，提供了三点信息。

第一，今种先拜天然函昱为师，后又脱离番禺海云系，转礼觉浪道盛，成了天界系的一员。有论者认为潘耒的上述说法是无中生有搬弄是非，挑拨今种与函昱及海云系法众的关系。其实潘耒之说并非没有根据，多种资料证明，今种脱离函昱而转投道盛是确凿不移的事实。潘耒在《与梁药亭庶常书》中就曾提到：“翁山本从天然剃染，复为觉浪门人。”^⑥ 钱谦益《罗浮种上人诗集序》亦有“上人归侍杖人”^⑦ 之语（“杖人”是觉浪道盛的别号）。在下文，笔者还会提到，今种还俗后曾以“同门”的身份向广州的有关各方证明大汕是道盛的弟子。他在给大汕的信（《屈翁山复石濂书》）中，也说自己“洞上正宗三十四代祖师亦羞恶而不肯作”^⑧，这更是他曾为道盛门徒的证明，因为道盛为曹洞宗第三十三代。如果他自认是函昱的门徒，就应该说自己“洞上正宗三十五代祖师亦羞恶而不肯作”。

① 欧初、王贵忱：《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② 欧初、王贵忱：《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页。

③ 欧初、王贵忱：《屈大均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④ （清）释函昱：《刻〈牟子辨惑〉叙》，见（清）释今辩《天然函昱禅师语录》，华宝斋书社2007年版。

⑤ （清）潘耒：《救狂贬语》，见谢国桢《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⑥ （清）潘耒：《救狂贬语》，见谢国桢《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⑦ （清）钱谦益：《罗浮种上人诗集序》，见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⑧ （清）潘耒：《救狂贬语》，见谢国桢《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道盛，号觉浪，住金陵天界寺，像函是，亦是曹洞宗的高僧和明遗民的精神领袖，在清初佛教界地位相当尊崇，被誉为“江南三宝”之一（另两“宝”是藏经与长干塔）。今种是哪一年变换宗门脱离函是而转拜他为师的，史无确载，笔者推测大概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或稍后。“大均”之名，有可能就是他转礼道盛之后的新法名，因为道盛的门人俱以“大”字排辈，如石濂大汕、无可大智、笑峰大然等等。清魏宪《诗持二集》录今种之诗，把作者题为“释大均”，便是一证。查今种的著述，“臣大均”之称首次出现于他顺治十五年所作的《御琴记》，他次年所作的《张文烈公行状》亦自称“大均”，当时他尚未还俗，这个“大均”显然也应该是“释大均”而不是“屈大均”。汪宗衍《屈大均年谱》认为魏宪题“释大均”可能是“以俗名为僧名”，但笔者则猜测他的俗名“屈大均”反有可能是以僧名为俗名的结果。

佛教界向来有转益多师的传统，在求法学佛方面一般没有门户的界域，因此今种脱离函是而转礼道盛，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若考虑到天界、海云两系的关系，问题就来了。天界系是曹洞宗寿昌法系的东苑支，海云系是曹洞宗寿昌法系的博山支，两系同出一源。道盛是晦台元镜和尚的弟子，函是之师道独是无异元来和尚的弟子，而元来、元镜又均是曹洞宗第二十六世寿昌慧经（字无明）的弟子。这就意味着，道盛与函是是法叔侄关系，今种脱离函是而转礼道盛，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结果，这就是使函是与他的关系由师徒变成了“法兄弟”！潘耒说他“欲与天然为雁行”，便是这个意思。明知转礼道盛会搅乱宗门的辈分，今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因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资佐证，我们只能通过逻辑推理来加以分析。今种转礼道盛，动机只可能三个：其一，想寻求政治庇护；其二，想进一步参究佛法；其三，想脱离海云系。第一个动机是很容易被排除掉的，因为函是与道盛都是明遗民的精神领袖，二人不仅政治立场相同，而且社会影响也约略相当，函是既然充当今种的政治保护伞，今种哪里还有必要再另寻？一个人总不至于在下雨时同时打两把伞吧？第二个动机也不成立，因为今种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的出家人，他自为僧以来就没有过学佛的心思。在排除了前面两个动机之后，最后一个动机——想脱离海云系，就成了唯一的可能。

第二，今种曾替大汕和尚（号石濂）捉刀为文，并因此而触犯了函是。潘耒言今种“代石濂作书”，确有其事。《救狂贬语》载《屈翁山复石濂书》就有“（仆）不过代兄作一《问五家宗旨》”^①之语，这说明大汕所撰的《问五家宗旨》是今种代笔的。根据汪宗衍先生在《屈大均年谱》中所做的考证，今种还曾替大汕撰写过《离六堂集自序》。今种充当大汕的捉刀人时间应在他还俗之后，因为他是到康熙初年才与大汕订交的（详见下文），此时他与函是已解除师徒关系，为什么还会触犯函是，不得而知。不过对于我们来说，知道这个事实已经够了，它已透露了今种与函是不和的信息。

第三，今种不但与其原先的师父函是关系紧张，与其同门也有矛盾。潘耒《与梁药亭庶常书》中也提到：“翁山本从天然剃染，复为觉浪门人。后返初服，与天然诸法嗣不相得。”^②关于今种“与天然诸法嗣不相得”的问题，今天也已很难从今种自己或他人的著述中找到具体的证据，但是以今种的心高气傲加上他在骨子里对佛教的排斥，他与今无、今释等同门会有矛盾，那是很可能的。虽然今天我们在今种和其同门的诗文别集中找不到他们相互攻讦的文字，但是我们同样也找不到他们相互推奖的文字。事实是，在海云系僧人的著述中压根就没有今种的影子，而在今种的著述中也差不多没有其同门的影子。考虑到今种作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重要地位，这种双方的失语是意味深长的。笔者还注意到，今无、今种曾先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和十四年（1657年）出关探访法叔函可，二人做的是相同的事情，可是他们之间却丝毫没有声气相通。这是不是他们之间存在矛盾的侧证呢？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今种与函是的门人虽然关系紧张，但是他与自己所未谋面的法叔函可，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函可，字祖心，号千山剩人。原是明万历礼部尚书韩日缵的大公子，于崇祯年间与法

①（清）潘耒：《救狂贬语》，见谢国桢《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清）潘耒：《救狂贬语》，见谢国桢《瓜蒂庵明清掌故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